

# 《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与时代价值

##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几点思考

薛俊强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在于把既定社会关系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纳入资本劳动的历史时空隧道中给予辩证审视,把政治经济学从作为财富生产与分配的古典形态转化为拷问经济生成规律的社会前提和人本价值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把经济、政治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为思考的核心,深度追问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构架和价值前提。当前《资本论》研究应从单向度批判与学术争鸣中走向积极建构,深度开展经济学、哲学和其他学科的跨学科对话,形成理论合力和学术共同体,彰显《资本论》解答时代问题的理论生命力和当代价值。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只有秉持《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性社会机理,探索驾驭资本、创新国家和尊重劳动的经济制度安排,才能书写出一部反映新时代中国发展变化和解答时代之问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关键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20)03-0001-09

目前,《资本论》研究在展开正常的学术对话和争鸣的同时,亟需形成价值共识和学术共同体。近年来《资本论》不是被误读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思辨话语哲学”,就是被庸俗化为缺少历史现实感和厚重感的“非批判的实证科学”,这必然严重遮蔽《资本论》对现代社会应有的现实解释力及其蕴含的巨大时代价值<sup>①</sup>。因此,理解《资本论》的精神实质和学科特色显得尤为迫切重要。这事关能否依然坚守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底色和价值底蕴,事关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未来和前途。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亟需坚守《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和以劳工阶级为中心的价值底蕴,深入对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性研究,书写反映新时代中国变化和破解时代之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收稿日期:2020-03-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欧洲左翼政党价值观教育思想及其启示”(19YJC710063);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博士基金项目“当代欧洲左翼政党价值观教育思想及其启示研究”(2018BS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当代欧洲左翼政党价值观教育研究”(SWU1809718);重庆市教委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研究阐释专项课题“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19SKZDX02)

作者简介:薛俊强,男,吉林白山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sup>①</sup> 目前《资本论》研究依然存在单向度批判倾向,体现在对《资本论》研究的哲学化和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倾向。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经济学家和哲学研究者在学术话语和理论对话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鸿沟,并且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这种情况不利于当代马克思主义走向深入。关键在于如何最大程度地整合各自研究的学术特长和成果,打破学科壁垒,坚持哲学思辨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彼此进行真诚和富有成效的学术对话。

## 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及其时代底蕴

《资本论》及其留下的大量经济学手稿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精髓,从目前遗留下来的大量经济学手稿和马克思当年的写作计划<sup>①</sup>来看,《资本论》是一部集经济史、政治史、世界史、工业文明史和劳工运动史为一体的综合性社会理论著作。

马克思通过对作为“市民社会”理论表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剖析了 19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与运行规律,建立其具有思想原创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资本论》通过对资本的生产、流通和社会总过程再生产的分析,展现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导演了一部现代社会发展史。“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sup>[1]</sup>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其之所以确立不仅仅在于商品和货币的出现,关键在于资本获得了可供其支配的劳动力。马克思批判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资本是积累的劳动的观点,通过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生成史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社会物质基础,洞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阶级关系的实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sup>[2]</sup>资本与劳动以物化的社会关系形式渗透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生活之中,商品、货币、交换价值、利润、剩余价值和阶级等经济范畴都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所依次呈现和抛弃的历史形式”<sup>[3]</sup>。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以资本主导的“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sup>[4]</sup>。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自觉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化,作为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产物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神秘化的社会形式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sup>[5]</sup>《资本论》打破了上述意识形态神话,揭示了资本隐匿剥夺劳动的生产机制,研究剩余价值生产和分割劳动的各种社会形式,对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及其文化生活的全方位思考,深刻洞察了“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sup>[6]</sup>,集中展开对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与政治领域关系问题的思考。它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劳动和价值等经济范畴的社会历史批判,把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批判性分析上升到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探索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从本质上来说,《资本论》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深刻揭示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特征,洞悉物对人的抽象统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前提。

《资本论》以其特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与对无产阶级及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结合起来。《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实质的分析,深刻洞悉以资本为主导形式的现代社会发展特征,深入剖析经济发展与人自由发展的二律背反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研究资本积累伴随贫困现象出现的生产机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探求实现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正义社会。《资本论》深度关切社会制度如何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和发展,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社会科学,开创了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核心内容的《资本论》是一门实践、批判和革命的社会历史理论,是面向社会历

<sup>①</sup> 关于马克思经济学说写作计划,前些年国内学者展开了广泛讨论,争论的焦点在于马克思晚年是否放弃了《资本论》的写作,集中展开了马克思大量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三卷本逻辑关系的争鸣,理论探讨的背后体现了学者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度关切。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具体可参见汤在新主编:《〈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年。

史关系和社会事实本身的历史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自我意识的主观批判,也不是直接描述社会现象的经验实证科学,而是通过对经济范畴的历史批判,呈现社会历史现实本身,反思人类的生存境遇和期待未来理想社会的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唯物史观给予现实社会历史本身以真正洞察,体现了马克思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分析而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批判。马克思运用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核心范畴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洞察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现实的真正实质,彻底告别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静态认知和形而上学假设。资本主义从来不是永恒存在的社会状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加以审视,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段插曲,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核心内容的《资本论》正是对资本主义历史起源和发展趋势的科学说明。借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势必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甚至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制度和文明,因为整个社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和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但是,情况又不始终如此。资本主义是形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日常生活)之中,资本主义作为‘经济’集合体的这种特殊的局部的形式只是通过相辅相成的关系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并在这种关系中显露自己的真相。”<sup>[7]</sup>

目前理论界关于《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或哲学著作的争论都是片面的,单方面从实证经济学的现象分析或思辨哲学的形而上分析,都不能很好地把握《资本论》所蕴含的思想精髓和方法论意义。当前《资本论》的研究应从单向度批判与学术争鸣中走向积极建构,深入开展经济学、哲学和其他学科的跨学科对话,形成理论合力和学术共同体,彰显《资本论》解答时代问题的理论生命力和当代价值。《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在于把既定社会关系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纳入资本劳动的历史时空隧道中给予辩证审视,把政治经济学从作为财富生产与分配的古典形态转化为拷问经济生成规律的社会前提和人本价值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把经济、政治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为思考的核心,深度追问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构架和价值前提,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高度审视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有着唯物史观切中现代社会现实本质的理论魅力。如果说以《资本论》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能够引领中国经济社会走向辉煌,其根本学理依据在于,只有站在《资本论》应有的思想高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深入现代社会历史深处,才能揭示出现代社会人被异化的深层社会根源,才能揭示出当代人货币化生存世界的本质,才能矫正人类世俗化历史发展的方向,最终实现历史的进步规律和趋势。<sup>[8]</sup>在理论深度和破解重大时代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其特有的思想精髓,依然是破解现代社会问题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并以其特有的时代现实感和理论厚重感指引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资本论》具有整合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底蕴和理论视域,涉及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内容,能够深刻辨别当前因生产方式、财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变化而出现的现代性问题,能够穿透纷繁复杂的社会表象,揭示资本的历史在场之谜。从与其他社会科学关注现实问题及其话语解释力的比较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没有很好地介入当前重大社会问题的分析中,没有彰显其应有的现实批判性和历史解释力。这一方面与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现实解释力和批判精神的缺失分不开,另一方面与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的学科壁垒和互动交流对话不充分有关。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亟需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内部对话,其中关键在于打破各二级学科之间的壁垒,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整体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加以研究和把握,深入开展哲学、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跨学科对话。“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sup>[9]</sup>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术话语构建离不开与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度对话,应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把经济、政治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为思考的核心,把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提升到经济正义的思想高度,把对经济现象的实证描述、数据分析提升到价值理性和人本主义的价值境界,用政治理性矫正经济理性,深度追问经济问题背后的价值前提,从人民利



益至上的思想高度审视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

不论是从其关注和所分析的时代问题之当代性,还是从其特有的思想性和方法论而言,《资本论》作为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社会历史理论,其体现的思想精髓和对时代问题的揭示,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具有历史现实感的时空坐标和分析框架。尽管《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及其生产关系,其研究对象和素材主要集中于对 19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特征和发展趋势的研究,但马克思依然基于全球化和世界各民族的发展情况,从宏观上考察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前景和趋势,在某些方面预见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发展形式,这从马克思遗留下来的庞大经济学手稿写作计划和晚年的人类学及历史学笔记中均可体现。“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sup>[10]</sup>《资本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和发展趋势,而且预示了资本主义对后发国家的影响,指出了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 development 阶段的客观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晚年为了回答俄国民粹主义者对俄国社会未来发展命运的问题,通过对俄国土地所有制和公社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提出了俄国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鲜明体现了马克思晚年不断推动《资本论》时代化和现实化的现实诉求。这为后人开展《资本论》研究奠定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空间。《资本论》只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庞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从现有的文献手稿和写作计划来看,马克思在世时只写出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和世界贸易发展史,而没有写出劳动和阶级的当代史。遵循《资本论》开启的分析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继续《资本论》尚未完成的工作,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走向当代的必由之路。尽管《资本论》没有穷尽对现代社会全部经济政治关系的分析,但其指出了分析现代社会的历史坐标,为深入洞察现代社会资本运行的本质及规律提供了极具思想深度的社会历史理论和方法论。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走向深入,社会主义与市场深度融合,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建立;不断探索出社会主义实现的中国道路和经验,资本与劳动关系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不断从博弈走向共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社会公平正义诉求不断得以彰显,资本被引导服务于全社会。当代中国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经验,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出新的时代课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已经不是当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笔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的危机困境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遭遇的现代化难题。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理由赋予《资本论》新的时代内涵和中国元素。“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世代都是一样的。”<sup>[11]</sup>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任务就是关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实质,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危机困境,认清当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变化的实质,消解当代资本对劳动的新统治形式,探索化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制度设计,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内在逻辑,探索当下中国资本与劳动和谐共生的社会制度安排。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基础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史和当代中国现代化进行过程中涌现的新时代问题。只有受到现代性货币、资本和金融体验的时代洗礼,人们才能真切感受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巨大现实意义。当代中国社会正步入现代社会的历史轨道,正在体验资本和市场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一切,正在进行一场马克思当年没有预料到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亟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出场。

##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亟需破解的时代课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为学术引导,具体研究当前中国重大现实问题,其研究内容应反映当前改革开放实践的现实诉求,揭示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结构性症结所在。总体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sup>[12]</sup>离开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资本与劳动关系根本变化原因的分析,离开了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结构的深入剖析,离开了对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深入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无法在解答时代问题中真正实现自身理论创新。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理应对当代中国资本、国家与劳动的关系做深层次的分析和把握,澄清资本和劳动关系背后交织着不平等关系的实质,基于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变迁的历史视野,全面分析当前国家、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复杂样态。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创新亟需加以关注的紧迫时代课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直面并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深刻变革带来的时代问题和历史经验,紧密结合新时代新问题。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来看,当前的关键在于驾驭资本和创新国家,抵制资本对社会公共领域的殖民化,探索国家治理和改革的新机制,实现资本与国家的良性互动,理性看待资本、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新的现象,资本、国家和权力关系更为微妙,资本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在收入结构方面,资本收入远远大于劳动收入在社会总收入的比重,劳动者收入提高与经济增长不同步,资本的经济权力本性更直观地体现在资本收入过高的经济生活中,市场和资本更深层次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与民众的公共生活之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秉持《资本论》思想精髓和方法论,深入开展对当代中国资本、国家和劳动关系运行机理的学术理论研究,直面时代问题,破解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资本主导、绑架国家和宰制劳动”时代难题,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应有的现实解释力和时代价值。考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资本、国家、劳动及其权力关系,需全方位考察当前中国社会的所有制结构、生产关系特点、政治结构运行的独特机制及其文化制度传统,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深入考察中国各级社会组织结构的特点。

目前关于中国资本、劳动和国家关系的学术研究更多集中于社会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其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中国社会阶层、劳工问题和资本收入分配等问题,比如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和人口红利的表述,从提升生产率和生产要素层面关于劳工待遇问题的分析等,这些研究更多是从分配和消费领域研究中国资本与劳动关系。不可否认,这些研究丰富了对当前中国社会诸多现实问题的认识,提供了理论研究必需的诸多现实素材。然而,上述研究没有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生产方式的变迁入手考察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忽视了思考“资本与劳动”关系产生的历史前提和实质,即“为什么这个自由工人在流通领域中同货币占有者相遇”<sup>[13]</sup>。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作为一种既定事实被不自觉地承认下来,出现“不去了解它(劳动人民)是如何改变的,哪一部分已经增长,哪一部分已经衰微或停止增长,而是选择一部分职业作为他们分析的中心”<sup>[14]</sup>的现状。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推进过程中出现的贫富收入差距扩大、国有企业底层工人生活困苦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等诸多社会矛盾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的这些社会问题,理论界存在不同声音,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澄清。关于中国资本、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国外学者有不同声音,有学者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成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变种,即新型国家资本主义,也

有学者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简单归结为权力和资本的二元逻辑结构。我们认为,上述几种说法过于简单,没有深入考察当代中国自身社会结构的运作和复杂特点,需要破除迷雾,澄清问题实质。从历史起源和当下现实来看,当代中国社会既不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代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是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的“大社会,小国家”的新自由主义。不能简单下结论说,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本力量强大、国家力量弱小,也不能简单说当下中国的资本力量弱小、国家力量强大。有学者区分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模式区别于西方经济政治模式的根本异质点,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等同于自汉朝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资本、中间资本和自由民间资本”的三元结构<sup>[15]</sup>。从经济和政治发展史角度来看,这个观点是颇有新意和创见,但能否把当代中国资本、国家和权力异常复杂的社会结构这样简单处理,还需进一步斟酌和讨论。仔细观之,上述观点仍然不自觉用西方现代以来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分法来审视中国社会结构。

从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来看,关键在于警惕资本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殖民化,坚守以人民为中心,探索中国资本制度创新机制,寻求破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摸索经济政治改革和社会治理之道,用秉持公共利益的政治理性矫正个人活动的经济理性,实现经济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有机统一,追寻经济发展与每个人自由发展相一致的社会正义,探索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安排。只有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和社会关系层面的改革,才能真正实现资本所蕴含着的民主化和人民性<sup>①</sup>趋势,把资本从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转化为全体劳动者共享的财富创造源泉,秉持“创新”和“共享”新发展理念,创立社会主义的人民财富论,彻底抵制“资本主导,绑架国家,宰制劳动”的体系构架,避免出现西方社会曾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sup>②</sup>。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非公有制)经济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结构,作为普照之光决定了当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和整体面貌,这一点必然反映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从现代性的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缺失西方市民社会的传统,不是西方现代性意义的法理社会,正因如此,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被费孝通先生概括为是一种“差序格局”<sup>[16]</sup>的礼俗社会,其独特的社会结构特点决定了中国社会迥异于西方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内含重人伦和志在大同的儒家文化基因、近代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性。这必然决定了中国语境下的国家并非资本的总代理人,中国社会也不是单一化个人的市民社会。天人合一和大同理想的独特传统文化基因、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并列为中国超越西方资本化的社会提供了契机和可能,这也是西方社会所不具有的制度特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关键在于把富有公共性精神的传统文化基因转化成规约资本运作的结构性社会力量,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形成制度化的驾驭资本之道。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不同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劳动报酬提高不相匹配,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差距扩大。因此,捍卫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底层劳动者社会权益,避免社会财富收入差距扩大,真正彰显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价值底蕴,积极探索中国资本制度创新机制显得尤为迫切。从总体上说,当代中国资本对劳动的赤裸剥削已不复存在,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资本对劳动的支配现象在诸多领域依然存在。从微观层面来看,目前资本对劳动

① 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其产生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雇佣劳动下,资本的社会关系体现了死劳动(物化的资本)对活劳动(个人的体力智力能力)的支配统治。实现资本民主性和人民性的意思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把资本蕴含的社会生产力回归人世界,让每个人支配其创造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消解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

② 国家资本主义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中,构成资本主义内具有的经济政治特质。其具体表现为资本与国家的共谋联姻,以国家主义支持资本主义,或者以新资本支撑国家,共同压制劳动者和广大人民。列宁、卢森堡等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着明确的论断和相关阐述,其具体观点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做了明确阐释。具体参见《列宁文集》(论资本主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213页。



的支配关系更多体现在一种“共享式”的所谓数字经济中。劳动从有形的物质生产形式转变为无形的非物质生产形式,资本与劳动并不直接在场,而是通过第三方中介发生关系。互联网金融、计算机网络办公和虚拟经济工作平台似乎解放了劳动者,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似乎隐而不见。这些新问题的出现模糊了人们对资本和劳动真实关系的认识,消解了资本与劳动的阶级支配关系。从根本上说,数字经济仍保持了资本增值的本性,资本以更加虚拟迷幻的形式追求着剩余价值,劳动者劳动形式的改变迎合了资本获利的内在要求,劳动者作为被雇佣的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劳动者的情感投入、业余休闲时间也都被卷入资本增值的无情逻辑中。“要了解当前数字劳工的组织形式,我们需要将其视为具有剥削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最新产物,而这种剥削可以追溯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源头。”<sup>[17]</sup>《资本论》把这一现象更进一步概括为工作日被资本的增值本性所侵占,甚至个人社交和休闲时间也不例外。“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sup>[18]</sup>无可否认,数字经济极大提升了社会生产效率,提高了社会生产能力,变革了传统职业的划分,但其本质依然体现了资本在虚拟世界中对劳动的隐匿统治。这里不是全然否定数字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而是进一步深入思考数字经济的资本属性,避免出现数字鸿沟和人被资本化的数字统治。正确引导数字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安排之间的联动效应。当代中国物质生产力的丰裕与人们精神生活的相对贫困成为亟待解决的矛盾。不可否认,目前作为金融化的资本日益成为资本的新形态,资本通过金融化不断膨胀和吸取社会财富而自身增值。通过虚拟化的资本运作,资本所有者获取巨大社会财富,而劳动者却获得很少一部分,资本占有者通过金融获取社会公共资源的财富。问题关键在于如何避免资本以创造社会生产力之名过度侵占社会公共资源,间接剥夺劳动者个人所得,这也是当前亟需警惕和应对的。当前人工智能生产形式日益成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重要方式,如何避免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条件下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依然是当前有待深入思考的时代难题。关于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不断调整资本、国家和劳动的关系,这集中体现当前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改革的摸索创新。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背后涉及资本、劳动与国家的关系博弈,资本、国家和劳动的关系从深层次上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始终,中国改革的核心在于处理好资本、劳动与国家的关系。如何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作用和政府支援弱势群体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两者相结合的机制,真正做到以劳动人民利益为核心,这是一个涉及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全方位工程。目前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断完善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兼容性,妥善解决处理资本与劳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使两者之间和谐共生,而不发生对立冲突。这一点需要政治智慧和政治定力,这也涉及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从历史观和社会发展进程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道路就是在发展和扬弃资本的过程中走过来的,这其中经历了抵制资本、发展资本和规范资本等不同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史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论述的真实历史写照和时代诠释。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在发展资本的同时驾驭并超越资本,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旨趣所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最终目标是把资本文明创造性转化为人本文明,实现对以资本为文明形态的现代性社会的超越。当前中国既不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也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问题不在

于抽象地追问到底要不要资本,关键在于引导和规范资本,使其蕴含的社会生产力得以发挥并被每个人所支配。

### 三、《资本论》时代化与中国化的光明前景

从对时代问题分析的思想深度和理论视域来看,《资本论》仍然蕴含着洞察当代社会问题极为宝贵的思想资源。当代中国社会呈现的问题比《资本论》所处时代面对的问题更为复杂,具有时代的特殊性和新特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需立足新时代新问题深化对《资本论》的当代研究,秉持其思想精髓,开展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书写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版本的中国版《资本论》。马克思晚年曾针对俄国未来社会发展道路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那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实践可否解答当年马克思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践设想?如果说马克思·韦伯当年出于考察作为现代社会劳动组织形式的资本主义之精神起源,深入分析了以儒教、道教为标识的中国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得出资本主义无法形成于中国社会,那么当代中国可否用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实践故事证明中国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可能性,从而开启人类新文明的崭新开端,这是当代中国最为激动人心和值得期待的价值期许。

中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极为丰富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不断致力于探索社会主义实现的中国道路和制度设计,致力于维护资本与劳动的和谐平衡关系,不断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这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经验素材。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深入回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时代难题和新问题,以鲜活的时代问题激活理论的时代效应,续写反映中国时代变化发展的当代《资本论》,真正书写一部破解时代问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关键在于以中国特有的时代精神,切实推动《资本论》的当代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时代内涵和中国元素,从而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新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条康庄大道集中体现为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探索和追求,最终被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历史总结出来的,而不是人为的主观设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承担起消解资本统治和弘扬人文价值的学术品格,能否承担起从思想上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未来发展,能否承担起从学理上阐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可能性的学术使命,从而对这个时代的突出社会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和他分析,把对社会问题的经济分析和哲学反思结合起来,在更为宽广的学术视域中深刻解答中国道路和中国奇迹背后的制度及文化根源,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和学术关切。

由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所引发的精神困境体现为生态危机和人的生存意义危机,上述危机被斯宾格勒称之为西方文明的危机。马克思把这个时代称之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工业文明时代,这个时代有着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特质:物对人的抽象统治。在斯宾格勒看来,两次世界大战和帝国主义战争恰恰是文明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征兆。“帝国主义是没有掺假的文明,是文化衰落的征兆”<sup>[19]</sup>。这种精神危机不仅困扰着当代西方,也困扰着现代中国精神家园的塑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丰盈与人们精神上的空虚形成鲜明对比,拜金主义的盛行,“占有金钱和货币”的资本意识形态似乎已经渗透到市场经济下许多人的内心世界,一切活动和交往都被打上资本的烙印。如何超越“资本”逻辑,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成为当代中国精神建设的时代任务。“如果没有一种既对我们本身具有积极的效准、又能真正‘消化’资本原则的精神——文化建制,那么,由唯利是图所开展出来的为所欲为,将会使整个社会及日常生活自行瓦解,并陷入一场全面的危机中。”<sup>[20]</sup>不可否认,资本已构成推动现代社会生产(物质、精神和文化生产)的精神动力,是工业时代和现代性的精神表征,欲望和金钱已经与个人的生命灵魂融于一体。只有回应上述时代问题,触



摸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动因和走进当代社会现实的历史深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才能切实彰显其研究的合法性和当代意义,从而在回应时代问题中实现其理论创新和发展。

注释:

- [1][4][10][13][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10-11、8、197、306页。
-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 [3]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63页。
-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0页。
-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
- [7]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顾良、施康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代译序。
- [8]张雄:《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3期。
- [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8-139页。
-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 [12]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系列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年,第36页。
- [14]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8页。
- [15]郑永年:《国家与发展: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文化纵横》2019年第1期。
- [16]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49页。
- [17]姚建华主编:《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导言。
- [19]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下卷,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0-68页。
- [20]吴晓明:《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及其思想资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责任编辑:叶颖玫]

## The Critical Spirit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Value for the Era in *Das Kapital*: A Discussion on the Innova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China

XUE Jun-qiang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Current research on *Das Kapital* should be shift from one-sided criticism and academic debate to active construction. It should aim to carry out in-depth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among economics, philosophy and other disciplines, in order to bring together theoretical synergy and academics and demonstrate the theoretical vitality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Das Kapital* in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of the times. The critical spirit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Das Kapital* is to bring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under established social relations into the 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 context of capital labor for dialectical examination, and to transform political economy from the classical form of wealth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to the social premise of examining the law of economic generation and the criticism of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istic value. It t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y and polit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of thinking for deep inquiries into the political framework and value premise behind economic issues. In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Chines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only by adhering t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ritical spirit of *Das Kapital*, by studying the structural social mechanism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and by explor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controlling capital, innovating the country and respecting labor, can we develop a critiqu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at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and answers the questions of the times.

**Keywords:** *Das Kapit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oretical innovation, Chines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